

周素园思想转变的原因考察^{*}

□ 卢 玲

(毕节师专宣传部, 贵州 毕节 551700)

摘 要: 周素园能从一名封建知识分子转变成为坚信马列主义、拥护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民主人士, 与他生活的时代背景、个人活动、家庭教育密不可分, 他的转变正是这些主客观因素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 周素园; 西方思想文化; 爱国情; 爱国实践活动; 转变; 启示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章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96(2004)04-0030-05

On the Diversion of Zhou suyuan's Thought

LU Ling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Bijie Teachers College, Bijie, Guizhou, 551700, China)

Abstract: Zhou Suyuan's changing from a feudal clerisy to a democrat, who insists on Marxism and Leninism, bears up the leadership of CCP, is related to the epoch he lived, his family education and his individual activities. His changing was the result of thes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Key words: western thinking and culture; patriotic sensibility; patriotic practise; changing; inspiration; Zhou Suyuan.

周素园, 字培艺, 1879 年出生于贵州毕节县城。幼年深受封建书香门第的熏陶, 有“读书做官”、“显亲扬名”的抱负, 并长于辞章之学, 思辩之理, 但其一生并未按最初的轨迹走下去, 成为动荡年代中的达官显贵; 而是从一名封建知识分子转变成为具有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战士, 继而又转变成为坚信马列主义, 拥护党的领导, 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爱国民主人士。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周素园从“读书做官”、“显亲扬名”的封建传统思想束缚中挣脱出来, 成为一名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令人敬佩的爱国民主人士呢? 笔者通过考察周素园所生活的时代环境, 家庭教育及其个人活动, 认为促其思想转变的原因有如下三方面: 一是当时国内新潮涌荡的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 二是周素园深厚的爱国情的影响; 三是周素园个人爱国救民斗争实践活动失败的影响。本文将围绕

此三方面对其思想转变原因进行分析, 以求教于专家同行。并通过对其思想转变的主客观因素的探讨, 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周素园所走的人生道路, 缅怀周素园为了国家民族的独立发展而不断追求真理的一生。

一、新潮涌荡的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是周素园思想不断转变的外部因素

从周素园的一生来看, 历经了清封建王朝, 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 时间跨度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其生活的清王朝以及民国时期, 国家正值多事之秋, 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基础的变形,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过程中与西方思想文化相互激荡, 并日渐衰微, 逐渐失去优势地位。中国由一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大国沦为了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面对国家、社会和民族命运发生转折

^{*} 该文为 2002 年校级课题“周素园研究”的研究成果, 完成于 2002 年 10 月, 2003 年 5 月报学校验收, 2004 年 3 月结题。

作者简介: 卢玲(1966—), 女, 毕节师专历史学副教授。研究方向: 思想史、地方民族文化史。

的重大关头,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积极主动的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如引进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成果,先进的政治制度等,但这种引进是很有局限性的,缺乏深度和广度,远远不能承担起解决中国社会各层面问题的任务。以至于当中国的有识之士把西方文化当作革新武器,进行“师夷”、“洋务”、“天国”、“维新”、“革命”活动时,结局如昙花一现。

经过失败、总结与反思,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办洋务、变制度不成的原因在于观念未变,而导致观念未变的原因在于落后的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于是他们着重从思想文化领域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再次把目光转向西方思想文化,力图从西方思想文化中去寻找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想文化的资源,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西方的思想文化被再次大量引进,而且引进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了第一次,尤其是西方各色各样的“主义”,也在同时期蜂拥而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个时期引进,并在斗争中扎根中国,广为传播。

西方的思想文化,乃至各色各样的“主义”的大量引进,开启了中国学习西方思想文化的大门,成为中国少数先进知识分子冲决封建思想文化专制网罗的武器,在中国思想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这些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自己引进学习的基础上,又以一个城市或一省为集散地,由点及面,逐渐向周边省区及边远省区辐射,向更多的人释放西方的思想文化,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周素园就是其中受益者之一。

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宣传下,十九世纪末,西方的思想文化在地处西南一隅,交通闭塞、经济文化长期落后的贵州也得到了传播。当时贵州一些赴京应试时受到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黔籍举人回省后进行了宣传,如贵州黄平举人乐嘉藻在1895年赴京会试时,深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在自费赴日本留学归国后,带来了大量图书,在贵阳大谈新学,吸引并影响了许多封建知识分子,在他们中间迅速传播了资产阶级进步思想。除此之外,一些具有强烈变法图强思想的外省籍清朝官员在贵州传播西学,如1894年,严修任贵州学政,到任不久克服了重重困难,创建了资善堂书局,书局的书籍,内容丰富,除经史子集俱全外,还有许多西方的自然科学书籍,社会政治历史书籍,以及不少维新人士的书籍。

西方思想文化的普遍传播,为周素园等封建知识分子提供了接触学习西方思想文化的良好外

部条件。1896年,年仅17岁的周素园由毕节到贵阳读书,开始有机会接触西学,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介绍西方思想文化、宣扬革新的书籍,如《校邠庐抗议》、《续富国策》、《出使英法意比日记》、《海国图志》、《万国公法》、《泰西新史揽要》、《时务报》、《湘学报》^{[1]270}等。这些书籍报纸扩大了周素园的眼界,改变了他只读诗书的状况,通过阅读这些新书,周素园认识了世界,了解了世界,也学习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学习了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思想文化,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贵州与全国的差距,对此差距,周素园曾描述过,当沿海各省及其它一些省城“渐知讲求西学,而贵州则蒙瞶自著,泊乎中日战役,地坼天崩,国际激刺,始予山中人以深刻之印象。”^{[1]237}而有所差距的原因就是清朝的腐朽统治,触动之中,周素园抛弃了自己所学的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不合理内核,向封建制度和封建专制统治发起了尖锐的批判。

1899年他写道:“方今外侮存至,内政又复不修,上下相蒙,政以贿存。嗜利黷货,结习深中于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天下之人以为筮仕皆以牟利固恬然不知怪,夫如是故汲汲以官为寄,而惟剥削侵渔之是务。民积困而不苏,国亦积弱不振。”^{[1]271}指出了封建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端。对于封建科举教育制度,他认为是:“涂饰耳目,欺网身心,习与用左,仕与学歧”。^{[1]271}当清朝统治者高唱变法实行新政愚弄百姓时,他又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今日时流标榜,方以学堂相夸耀,而仆鳃鳃焉。……教习无通人,学生无正士,“岂能淬励知识,开拓心志耶?以言育才,是适燕南辕之说也。抑仆观今所谓变法皆将徇人,非以为果有益于我也。政府虑外人之道,则以变法缓之;……究竟破除积习者何人,实力奉行何事,祸患之兴,正未知所终极,不出数年局面又将更易”。^{[1]272}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清政府实行新政是假,而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讨好洋人是真。从此,他从一个受汉宋学说熏陶至深的封建知识分子,转而接受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并适时提出了“注意教育以开民智,提倡实业以抗外力”^{[1]271}的主张,以及建立革命团体进行革命的主张,指出:“我辈革命死,不革命亦死,等死了要以为革命死为最大幸事,何惧哉!”^{[2]118}实现了其人生旅途中的第一次思想转变。并充分运用资产阶级进步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积极投身于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的斗争洪流中。

革命失败后,周素园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流

亡生活,十余年中,他在尝尽了人生中的颠沛流离之苦的时候,也再次迎来了西方思想文化对他的洗礼。这时马克思主义思潮已被大量引进,各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报纸如雨后春笋,这为流离在外的周素园创造了再次学习西方思想文化的外部条件,尤其是在北京、上海、武汉等这些大城市开展的如火如荼的反对军阀统治的救国救民活动,以及国共合作后形成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对周素园震动很大,周素园开始去接触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开始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初步了解了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

1925年9月,周素园从上海返回故乡毕节,他从上海带回了大量的图书,认真研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民约论》等一批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名著;阅读了郭沫若三十年代初以戏剧对话的形式意译的《资本论》;阅读了鲁迅的《呐喊》、《彷徨》、《坟》、《热风》、《朝花夕拾》等文学名著;阅读了当时刊行的《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申报》、《新中华报》等报刊杂志。然而他更倾心研读并对他的思想产生巨大震荡,对他后半生起根本性影响的,莫过于一批马列主义的原著和介绍马列主义的书籍,如《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通俗资本论》、《新政治经济学》等,对这些书籍,他不仅读,还作了许多眉批。

从1925年至1935年十年中,周素园通过阅读大量的书籍,尤其是马列主义的著作,他在书本中吸取新知识的同时,也在书本中找到了真理,找到了正确的世界观,于是他对自身的道路、思想历程作了认真的梳理。1935年9月5日,他在一封家书中写道:“余近年常阅读书,加以冥想旁证,颇能日趋于解放”。后来,他又说:“五十(岁)以后自己有了一个转变”,对自己过去十分得意的许多古文著作,甚至“感觉这些东西,只合扔向垃圾堆里去”。在对思想进行反思的同时,周素园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并对许多社会问题,如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宗教问题、教育问题等作了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初步树立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1936年2月红军长征途经毕节时,在王震、肖克等红军将帅的帮助下,周素园更加坚信马列主义,虽年届五十七岁了,却义无反顾地追随红军长征,成为一名红军战士,经过多年的追求,周素园在完成自己思想质的飞跃的同时,也找到了人生的归宿。

二、深厚的爱国情是周素园思想不断转变的

内在因素

综合分析,我们已知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为周素园思想转变提供了文化土壤,是促成周素园思想转变的外部因素,而潜在其内心的爱国情应该说是促成周素园思想转变的内部因素。周素园有如此深厚的爱国情,一方面源自于其良好的家庭环境及所受的教育,另一方面与其所处的特殊时代息息相关。

从有关周素园的身世述略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周素园有一个具有良好文化氛围的家庭,是书香门第之后,其“曾祖讳履衢,拔贡生,直隶开州知州。祖讳邦彦,浙江东阳县县丞。考讳起京,封直隶大夫”。^{[8]3}其父周煦“弱冠遂通诗古文法,为名诸生,以教师塾为业,53岁以后,经部选为两任本省松桃厅训导。”^{[1]269}其母刘氏“出身于本县富户”刘百万家……少读书,博闻而强识。”^{[1]269}从上引资料中不难看出,周素园的祖辈及父母都是读书人,他们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中,以科显第,成为封建国家中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而对其后人,他们同样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去影响家中后代,造就他们的成长。

父辈的学识为周素园打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创造了条件。周素园从小就有条件在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海洋中畅游,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营养和知识营养。

在《周素园生平大事年表》中有如下记载:周素园四岁在其母的启蒙下就开始读唐诗及《礼记·曲记》;五岁开始读《四书》、《五经》;十四岁学《昭明文选》、《唐宋八大家钞》;^{[2]1395}以后又学了《国语》、《战国策》、《史记》、《西汉文》^{[3]54}等等。周素园所学的这些典型的古代著述,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不仅以文辞章句的工整优美著称于世,其思想内容对后世后人的震撼则更具魅力。如“四书”、“五经”中包含了儒家所提倡的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唐宋等朝的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李白的诗,苏轼的词中,我们可随时看到他们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的佳作。还有历史上那些名垂青史的爱国者的民族气节和献身精神,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岳飞的“精忠报国”;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更是让后世后人没齿难忘。在周素园成长的历程中,这些传统思想文化时时伴随着他,影响着他的成长。周素园通过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学习,不仅以

善辞章蜚声于省内,同时,也在其心中根植了深厚的爱国情。

良好的家庭教育造就了周素园报效祖国的潜质,而中国当时特殊的环境则更进一步的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这股爱国热情成了他虽历经挫折,却不放弃追求进步思想、寻求报国救民真理的支撑点、内动力。

从周素园所处的时代来看,是一个多事之秋的时代,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大地风雨如晦,灯烛无光,忧心忡忡的爱国志士们,不断提出了拯救祖国于危亡的思想和主张。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维新思想的先驱魏源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七十年代,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又提出“振兴”中国的主张;九十年代,维新思想家则提出了“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的先驱孙中山则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一鼓舞人心的爱国口号。同时爱国活动层出不穷,高潮迭起,有戊戌百日维新,有以农民为主体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有孙中山等人领导的武装反清斗争。春雷激荡的爱国主义思潮与跌宕起伏的爱国活动,感染了血气方刚的周素园,激发了他的爱国心。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周素园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溶入到这个时代的爱国洪流中,甘舍一切功名利禄,“而极究心时务”,^{[3]117}所以当贵州学政严修劝其钻研经学时,他拒绝了,理由为:“中东之役,丧师辱国,强邻环伺,惧陷瓜分,我辈尚不亟谋改良政治,以图救亡,宁再事咬文嚼字耶”。^{[2]117}周素园的表白,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他自身所特有的那种对国对民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深深的社会责任感,更为可贵的是,表白说明了他已经意识到封建旧学已不可能起到拯救国家民族的作用,于是坚定了与封建旧学决裂的决心,转而关注在省内外广为传播的西方思想文化,吸取其中的合理成分,完成自己思想的不断飞跃。

三、爱国救民斗争实践活动的失败是周素园思想不断转变的推动力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由于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以及周素园自身的爱国心的驱动,周素园在抛弃了自己思想中不符合时代需求的成分后,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并用它指导自己的行动,积极投身于爱国救民的活动中。

为了实现救国民于水火中的目的,周素园首先考虑到办报。他认为:“贵州之行省也,地形限之,人智塞之,物力困之,自设治以来至于今,其思想、其知识,大抵时代之落伍者也”。^{[2]236}所以“欲

传播革命思想于多数”,^{[3]117}“鼓吹爱国主义思想,反对列强瓜分中国,唤醒群众,推行政治改革”。^{[1]275}“非报纸不为功”。^{[2]117}1907年,经过多方努力,周素园创办了贵州第一家报纸《黔报》。《黔报》创刊发行后,周素园收到了不计其数的青年来信,信中表达了他们的心声:“贵州本是一个盲哑的社会,你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和喉舌。你要维护你的报,发展你的报,不要令我们甫尝生趣又陷入黑暗和苦闷的深渊里!”^{[2]419}这让我们看到了办报对贵州社会的震动,“有如一石击破古潭死水,它给贵州许许多多的中下层封建地主阶级青年知识分子,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春风,打破了笼罩贵州社会的沉闷气氛。它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传播了先进的思想,唤醒了一切爱国志士的热忱,为贵州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作了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1]275}

继之,在1907年11月,他又与张百麟发起创建了贵州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自治学社,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如在1907年夏秋之交,召集贵州各界开会,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颁布宪法,周素园还为此次会议撰写了《请愿书》,这是自治学社开展的一次争取民主权利的宣传活;1910年11月,自治学社发起国民捐运动,以响应当时天津商会发起的筹还国债运动;组织社员与当时贵州宪政党展开斗争。诸如此类革命活动的开展,使自治学社在群众中扩大了影响,当时地方上“一切爱国的,具有革命思想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参加自治学社,分社遍及全省,社员骤增至十万人。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大军”。^{[1]277}

1908年,张百麟写信给同盟会,要求加入同盟会。同盟会接纳了贵州自治学社,自治学社成为同盟会的一个支部。在武昌辛亥革命首义成功后,贵州自治学社也于1911年11月起义,成立了大汉贵州军政府,周素园被推为行政总理,主办民政。周素园又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革命政权的建设中,常常“逮晚澈夜不眠,耳不断听,口不断说,笔不断写,头脑发昏,目赤如血”。^{[3]33}为了革命事业的成功,周素园几乎是鞠躬尽瘁,舍小家为大家,但事与愿违,周素园的种种努力,最后都付诸东流。

从其办黔报来看,周素园想通过办报来“开通明智”,激发贵州民众的斗争热情,但因政见与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尖锐分歧,无法满足心愿,最后忍痛脱离《黔报》。为了贵州辛亥革命的成功,周素园可谓是倾其精力,注入了满腔的激情,鞍前马

后,忙个不停,以至于夫人病重也无法抽身照料,与世长辞,但革命仅成功几个月,就在省内外反动势力的颠覆下失败了。这一系列爱国救民斗争实践活动的失败,并未导致周素园颓废,丧失意志,而成为他在艰难的流亡生活中继续为革命奔走呼号的推动力。

贵州辛亥革命失败后,周素园被迫弃子离乡,开始了长期的政治流亡生活,其间,他一边致电北京政府、孙中山、袁总统。一边写下了《贵州血泪通告书》、《稽勋表册底稿》、《黔人冤愤团宣言书》,将贵州自治学社革命的经过与云南军阀唐继尧等破坏贵州革命的情形一一叙述,声讨滇军及反革命派,呼吁声张正义。1916年在与张百麟商量斗争策略,即“无论何党何派能解决贵州问题的,我们便和他合作”。^{[1] 429}之后,周素园便与军阀徐树铮、袁祖铭等周旋,然一切皆为徒劳。正如他自己后来在蓝格本《素园书牍·第三卷跋》中所述:“是时亡命初期,妄意社会尚有是非,国家尚有法纪,竭吾力所能,从多方面哀吁而呼诉,顾其效乃甚微”。^{[1] 281}痛定思痛的周素园看清了导致其效甚微的根源在于各派军阀间进行的厮杀混战,大半个中国皆成为了他们的战场,百姓却因之家破人亡,百姓的苦难及个人的遭遇,使周素园感慨万千,对此感受和遭遇,他曾在给张百麟的信中作了描述,他说:最初他还“雄心勃勃,以为身临前敌,数年来卧薪尝胆,复仇之机会至!乃一察其内容,与我之希望者不啻背道而驰。且日受群小之排斥,直不能一朝居。”^{[1] 285}所以他在一篇文中愤怒地写道:“一部二十二史,相斫相杀,暴君污吏,弥望久矣!”^{[1] 289}这不仅是对封建统治时期统治阶级残暴的控诉,也是对辛亥革命之后全国军阀大混战的写照和控诉。

时代环境的恶劣,使得颠沛流离的周素园认清了军阀的丑恶嘴脸,他放弃了利用军阀力量去实现其爱国救民的幻想,同时思想上感到极度的徬徨,“进退失据”。而在这个时候,国内政治上思想上的新变化给了他新的启示,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新的思潮已传遍了神州大地,而以此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军阀斗争则蓬勃发展,新的思想变化和新的政治气象,促使周素园去重新审视自己的思想历程,重新寻求救国救

民的指导思想。于是他再次从逆境中奋起,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和介绍马列主义的书籍,找到了马列主义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初步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1936年在与红军接触后,更加坚定了这种信念,最终完成了自己在思想上的又一次质的飞跃,找到了思想上的最终归宿,成为了一名与中共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

综上考察,我们看到了周素园所走的不平凡的人生道路。为了国家民族的发展,为了家乡的发展,周素园不断追求进步思想,这种行为,不但为当时的先进青年作出了榜样,而且也给当代中国青年,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的、有益的启示。启示至少可以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要有爱国思想。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自觉爱国是周素园不断追求进步思想的支撑点和内动力。当前我国正处在要复兴中华民族的关键时期,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因此,负历史重任的当代青年,更要增强爱国的自觉性。二是要有勤奋学习思想。童年的周素园勤奋好学,成年后,崇高的救国救民的抱负,强烈的求知欲望,养成了周素园惟真求实的态度,从而使他日益接近真理,并最终确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尽管他最终没有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人,但我们可以看到孜孜不倦的学习是他进步的因素之一,所以当代青年应从周素园勤奋学习中,得到深刻启迪,认真学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努力把自己造就成社会所需的人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 [1]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办.周素园同志传[A].贵州党史资料·第五辑(内部资料)[M].贵阳:中共贵州省委党史办,1982.
- [2] 周素园文集[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 [3] 周素园.贵州辛亥光复的史实[A].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 罗仲祥)